

· 哲学符号学研究专题 · (学术主持: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近几年,“符号学”这门生僻的学问,电影里的教授从事的罕见专业,在中国成为显学。关键词为“符号学”的论文,每年超过2000篇,而描述各种“符号”(却很少触及符号学理)的论文就更多。由此出现一句常听到的话:“符号学是人文学科的公分母”,或者更干脆的“符号学是文科的数学”,此二说都是在描写符号学强烈的“有用性”。然而,比喻总是跛足的,实践中真的效用,才是最有力的证明。

符号学就是意义学,这就注定了符号学远远不止是一种方法论,而是意义哲学:哲学符号学探索人类意识的根本存在方式:那就是意识必须不断地寻找意义,事实上意识靠意义才能存在,而不仅是意义靠意识才能产生。人们不断地在世界上寻找意义,很像动物不断地觅食。动物有时也寻找意义,就象人也不得不觅食。但是人作为人、有“意识”的人,不得不靠意义才能生存。而意义与意识的联系,必须来自符号。意义就是靠符号发生并获得解释的意识与世界的联系方式,简短地说,意义就是主客观的关联。

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哲学符号学又称为符号现象学,只不过现象学更重视意识,而符号学更重视意义。皮尔斯的现象学研究,与胡塞尔发起的现象学运动,在这里找到了连接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说:符号学不只是方法论,而是一种探索人类意义活动规律的哲学。他必须处理三个大范围的哲学根本问题:意义活动如何构成意识,意义活动如何在个人意识中如何积累成经验,意义活动如何在社群意识中沉积为文化。

在本期“哲学符号学研究”专栏的两篇文章中,谭光辉教授分析了人的感情这种最基本、却也是最困难的哲学与心理学难题,他建构一个“哲学符号学情感论”的尝试,值得学界注意;另有本人拙作一篇,试图讨论意识与物世界的关联方式,这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很容易把貌似简单的问题分析成话语迷宫。两个重大的问题讨论,只能等待同仁给我们指点与帮助。哲学符号学正在起步,也只有倾听大家的指点,这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才能有发展的可能。

实践意义世界是如何从物世界生成的^{*}

赵毅衡

摘要 实践世界,是人的意义世界至为重要部分,是意识作用于物世界而形成的。实践意义世界的构成,实际上由三个重大人类活动作为推动:认知识别,理解判断,改造取效。这三种活动看起来很不相同,却都是意义的实践化。如此产生的实践意义世界,是符号与物的混合:带上意义的物,已经取得符号性,因而其意义能被我们理解;而在意识之外的物,尚未被人理解,则成为自在的物世界。

关键词 意义世界;自在物世界;认知;理解;取效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6-0015-07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6.003

作者简介 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成都 610065

一、物世界与意识的关系

对于物世界与我们的意识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的了解至今很粗疏。但是我们肯定知道:

有一部分物世界,我们的意识理解并实践于其中,但是肯定有另一部分物世界,无论其广度还是深度,我们至今尚未认知。人类对世界的知识在飞速扩大,却总是会存在一个未被人认知的物世界,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的阶段性成果。

自在于我们的意义世界之外。的确,人类的知识范围永远在扩大,这个趋势不会终止,却反过来证明这个未知世界的存在:比起知识很少的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我们今天反而更为肯定:我们的意义能力之有限。

我们的意识所能及的这部分物世界,是“实践意义世界”,它包含了意识对物的认知、理解的积累,以及知识对物的改造使用取效。而一旦人的认知参与进来,至少这部分世界,就不再是自在的世界,而是人化的世界。人化世界的组成单元,是符号与物的化合物,就是所谓“符号-物”二联体,意义世界的一切都在符号性与物性这两个极端之间滑动。

所谓人化的世界,不再是自在的物世界,而是充满了意义的符号世界。因为符号是意义活动的必然的无可另选的方式: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任何意义,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既没有不用符号的意义,也没有缺乏意义的符号。这样,实践意义世界是符号与物的混合:带上意义的物,已经取得符号性,因而其意义能被我们理解;而在意识之外的物,尚未被人理解,则成为浑然不可知的自在物世界。

许多理论家认为:“符号世界”与“物世界”的区分,在于人的世界由符号组成,而物世界是混沌而无意义的。索绪尔认为,整个非符号世界“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不清晰的……只是混沌不分的星云”。^①卡西尔认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②某些理论家则进一步认为意识之外的世界也由符号组成:皮尔斯认为:“整个宇宙……哪怕不完全是由符号构成,也是充满了符号。”^③霍夫迈尔把从大爆炸开始的整个宇宙史,描写成充满符号意义的历史。^④但是他们也只是就人类的理解潜力而言的,说“整个宇宙”只不过是已经被人类符号意义化的宇宙,只是就可以观察到的“大爆炸”遗迹(例如“红移”、“辐射背景”等等)在讨论,而这些“符号”已经成为人类实践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自在的物世界,不仅是混沌的,而且是无法给予符号意义的未知世界。

必须及早说明的是,所谓物,包括各种生命,

各种他人,也包括容纳意识的本人的身心,它们都是主观意识之外的对象,实践世界就是物被“对象化”(objectified)的结果。我检查我自己的血压、或认知能力,是把我自己当作认知对象。有人称之为“物化”,在本文的论述体系中,物在意向性的压力下成为对象,对象就是意义化的物。“物化”指的是符号完全丧失意义性,而“对象化”是物的符号化,应当是两个相反的概念。^⑤

对象和事物之间,有重大区别:事物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有可能会被人“理解”,也有可能本质上不可知,对象则是向意向性反馈意义的物的观相。胡塞尔对此区别的论述是经典性的:“现象学的对象并不被设定在一个自我之中……而是被设定在纯粹自在的直观中被把握的绝对被给予性。”^⑥对象就是被意识把握,并由此获得意义的物,是被意识认为已经把握住的物,虽然把握住的只是物的贡献意义的观相。意识是否把握住事物的“真相”,却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物成为对象,是同获求意义的意识发生了关联,在这种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被理解的对象才会存在。我理解到此物是一枚苹果,只需要苹果的一部分观相,苹果作为物的全部品质,远远没有被我们掌握;甚至“此处即将地震”的预报,可能并非确切,最后被证实为误报,但是,这个警告谈到的地壳运动,已经成为对象,而不是自在之物。^⑦

“实践意义世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物世界的一部分意义化,构成了人类社会性的意义世界的重要部分,这一部分在人的社会性意义世界中,在人类进化史上,至为重要。生物的世界主要是实践意义世界,而人尚有很大一块非实践的意识意义世界,但是人的心灵之形成,是从实践性地掌握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实践意义世界的形成,可以说由三种意义活动作为推动:认知知识,理解判断,使用取效。这三种活动看起来很不相同,却都是人的意识与世界交会的产物。石器时代的人,需要认知并命名石头,理解判断其硬度光泽,然后加工转换成武器工具,例如用黑曜石做刀斧,或辟邪宝石。

人类的智慧不可能完全了解物世界,哪怕在未来也不可能:我们所知的只有一部分,甚至究竟

未知部分有多大我们都不得而知,宇宙万物,在微观上,在宏观上,永远有人不可知的部分。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甚至认为某些未知部分可能根本不具有“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哪怕我们自以为已知的能把握的“实践世界”部分,我们也只是“自以为”理解,而判定“理解”的标准。于克斯库尔所说,关于周围世界的理解能“帮助物种生存”,这种效果论,不能作为“真知”的标准。^⑧所以我们自以为已经把握了意义的物世界部分,也是应当存疑的。

因此,人类的“周围世界”实际上很有限,虽然我们自以为比动物的大得多。而我们周围世界的有限性,来自一个巨大的悖论:我们对自己的意识(“我心”)所知可能更有限,而且在人类历史上晚出,远远晚于也少于我们对“实践世界”的自以为是的把握。这在思想史上很明显:对于心物关系的理解,虽然贯穿了思想史和科学史,却是人类生存史上的新课题,我们对心的了解显然很不够,不然也不需要如此急切地推进认知科学。虽然建立实践意义世界,是人进化成人时就开始努力了。

卡西尔指出:“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⑨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到陆九渊,到朱熹“性即理”,到王阳明“心即理”;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阿奎那斯,到康德,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经过两千年的思索,哲人们逐渐接近一个看法,至今规模宏大的“认知学”,考察的重点不是被认知对象,而是认知本身,也就是人的意义世界中的“思索世界”部分。认识自我,始终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

近代哲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认识论转向,康德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以理性批判精神,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深入彻底的解析,从而完成了理解意识的“哥白尼式革命”。人性不再是一种实体性的本质,而是一种结构功能。在知识生成中,主体对世界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具有主导地位,不是自然为人立法,而是人为自然立法。康德认为,意识的秘密就是绝对自我澄明的先验意识。对人的意识的理解,开始成为思想的核心课题。

20世纪初涌现出来的批评理论,无论是现象学、符号学、心理分析,都是围绕着意识的构造而建立的。

胡塞尔说:“经验自我不是真正纯粹的自我,因为感觉经验材料是由外在的‘物自体’刺激引起的,并非纯粹自我本质”。他又指出:“现象学的对象并不设定在一个自我之中……而是被设定在纯粹自在直观中,被把握的绝对被给予性。”^⑩也就是说哲学的主要问题,不是心,不是物,而是心物关系,而是意识世界如何成为构成意义世界的跳板。于克斯库尔认为,周围世界是所有的物种所具有的,实际上动物的意义世界,很可能只有很有限的实践意义世界,也可能几乎完全没有心灵世界。而人的实践世界却是由意识世界派生出来的。因此,意识与实践世界的联系方式,成为整个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

二、人类的三种实践:认识识别,理解判别,改造取效

各种物都是被人的认知实践所揭示出来的物,越是通过复杂精密的仪器才能观察到,越能说明物是“被呈现”的,对物的认知,是意义世界的基础。此时的物呈现的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某一部分观相,也就是说,物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符号载体。

反过来也是如此:解读一个符号文本,与认知一事物,没有根本的区分,实际上在意义认知的第一步,在形式直观阶段,我们很难对事物与符号加以区分。胡塞尔讨论过蜡像馆中蜡像(符号)与真人(事物)的混淆,他说:“一旦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觉,情况就会相反。”^⑪但是只有对叠加符号意义行为作进一步探究时,我们才明白二者的区别。

贡布里希也具有类似论述:“植物课上使用的花卉标本不是图像,而一朵用于例证的假花则应该算是图像。”^⑫这位植物课老师手里拿的是假花(符号),而“标本”是真花(事物)。但是对于课堂上的学生而言,假花(符号)与真花(事物)意义会有什么区别呢?除非学生看出二者形式不同,那样她们就是不同对象,会导致不同意义。但是,

事物的认知识别,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适合人的实践需要的。爱斯基摩人识别几十种雪,阿拉伯人识别多种骆驼,中国人识别几十种玉,他们的认知识别,都是无数次意义累积的产物,这种重复而形成的经验,成了他们各自意义世界的基础。

意义世界,是意识用符号再现的世界。有不少人承认:意义并非实证科学能完美解决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意识的存在,但大多数怀疑意义是否有可能存在。意识可以从进化论角度讨论,但是从纯粹科学(心理学)的解答,不是解答,而是问题本身。”^⑬科学可以观察到认知过程的细节,但是无法解决意识与意义世界之间的跨度问题。

李广昌教授认为:“人关于意义的创造和追问,先发出一种哲学图景,这种图景被称为‘意义世界’。”^⑭笔者认为这个描述相当精确。符号学揭示人类认识伸展这种符号活动中的统一性,因而成为一种原则上包括实践和共识两方面的知识,即便在其特性中仍然主要是共识性的(如果愿意,也可称之为“哲学性的”)。“思辨和实际这双重方式认识下的符号学”……符号学作为后现代特色的发展,同时包括了实际认识和思辨认识。^⑮

杨国荣教授仔细讨论过“意义世界”的物与意识复合问题,但是他强调物世界的奠基作用。^⑯笔者认为意识对意义世界起奠基作用,这是我们在意义世界概念上的根本分歧。杨国荣批评胡塞尔说:“现象学在某些方面已注意到意义的呈现与意义的赋予在意向活动中的相关性……现象学在总体上似乎更多地突出了意义的赋予,而对事物的呈现则未能给予充分的定位;就此而言,显然很难说它已真正把握了意义生成过程中二者的互动和统一。”^⑰他的意思是胡塞尔没有足够重视意义的物性方面。笔者并不主张意义世界理论必须追随胡塞尔,从本书第一章开始,就会谈到与胡塞尔的重大区别。但是就这一点,就意义世界是心源还是物源,康德与胡塞尔的立场比较能服人。

罗素说:“我的信念是,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其中之一的内在性质,而在于我们获得关于其知识的方法。”^⑱这样就把

“心物何者为世界缘起”这个看来永远纠缠的难题,变成了一个认识论问题。如此做法是否有逃难题之嫌?不一定,意义理论本来就是认识论问题,虽然最后还必须在形而上的本体地位上理解。我们自以为了解的,看起来客观的物世界,实际上只是物世界与意识世界叠合的部分,即实践世界。既然物世界永远有不可认识的大片晦暗,意义世界不得不以意识为基地,从心灵的趋向出发,达到与物世界的实践交会。

意义实践第一步是认知,人类的意识认知各种物,从了解他们的最基本性质(例如知道石头硬,水果甜而多汁,夜空多星),到了解他们非常复杂的物理化学构成。我们可以把这些都称作“事物的呈现”,哪怕需要复杂仪器,或改变正常条件(例如高温条件下熔化或气化),才能呈现相关品质,物在意识的获义意向性压力下的意义呈现,本质上没有变,依然是存在变得可知的最基本环节。物在这种条件下给予意识的获义意向性以形式直观,这种直观是意义自我澄明的本质出发点。

对象的意义给予性,是意识与对象双方得以存在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物就不再是物,而成为意识的对象。但是人不会满足于认知的这个阶段。认知的叠加与深化,就会引向对物的理解判断与改造取效。

关于物的认知,恰恰并非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认知是整个实践意义世界的基础层,只有在意识的意向性实践中,物才呈现自身。我们对意向性所及范围之外的自在之物,除了说它是自在的之外,无法再说什么。

人对物的认知,对物的命名,已经包含了对物的性质之理解与描述,是实践世界意义化的出发点。彭佳教授指出:“汉族为几千年来从事农耕生活,故有24节气。而长期生活在高原和海洋地带的民族,他们对节气和日历的能指划分,也往往和生活习惯相关,如台湾达悟族的时节划分中就有“飞鱼季”,而藏历则根据杜鹃鸟、戴胜、野鸭等的活动来进行划分。”^⑲这种对物世界的理解,不能狭窄地规定为“物”,人际关系之类的似乎抽象的对象,也是实践意义的领域。赵星植指出:“礼

物交换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符号表意实践活动……礼物就是馈赠者相受赠者传递‘关系意义’而采用的符号载体。”^{②①}

在理解判断之后,则是改造取效。这一步往往不被人认为是意义行为,而认为是实际操作行为。实际上人的操作行为,也是一种意义活动,而且往往与理解判别很难区分。理解的目的是取效,不可能有完全脱离取效的理解,所以本文放在一起讨论。这两步都属于取效的目的论或价值论的范畴,而不是认知识别的认识论范畴。改对象对我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辨别对我有什么用,都是在回应我的目的,即通过某种努力能期待使它具有什么实践意义。因此,理解与取效这二者中的“意义”,都是有一定目的的某种“用途式的意义”(meaning as purpose)。^{②②}我们可以说某种生活是“无意义的生活”(meaningless life),大致等于说此种生活,对社群的利益来说,没有目的,也就是没有价值。

这最后一个阶段,在现象学家舒茨看来最为重要,他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工作世界”,他把单纯的认知思维,与工作实践的领域区别开来。人对世界不仅仅具有理论的兴趣,而是需要对世界的意义进行实际的“支配”。在工作世界中,人精明成熟,意识充满张力。工作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是意义最重要的现世存在:“它是我的各种运动和身体操作的领域,它提供要求我努力去克服的各种抵抗,它把各种任务摆在我面前,允许我把计划进行到底,使我试图达到我的目的从而导致成功或者失败。在工作中,我们总是运用自己的身体参与它、接触它、改变它,世界首先不是一种我们思想的客体,而是一个我们支配的领域。”^{②③}而于克斯库尔认为:“周围世界是一个有机体以自我为中心构成的世界—有机体生活在这个世界,认知并塑造这个世界。”^{②④}实践世界是被认知并被实践塑造出来的。

目的与价值,的确是人类的实践之最重要领域,是实践意义世界的终极部分,它们与认知的不同,在于人类的意义评价体系主导了意义的生成。这时候的“意义”,是符合某种社群的评价要求,而并不是朝向人类共同的对事物的获义意向性。

对于某个社群“有意义”的事物,例如《小时代》描述的公司办公室生活对白领小资“有意义”,《后会无期》的上路冒险生活对于追求个性的小知识分子“有意义”,恐怕两批粉丝观众互相瞧不上对方的“意义”,但是无法否认这些方式都是实践世界中有意义的活动方式,而且其意义多半以文化社群的利益为标准。目的论渗透在人的实践中,人的文明必须有一定的目的才能建立,

三、世界在实践意义中的变形

正是由于实践的重大意义作用,世界就并不完全是意识臆造的,并不完全是头脑制造的假相。固然思索所得的意义,有自我设置的部分,有不自觉地满足心灵的某种隐秘需要的部分,“真知”的部分标准,是文本的内部与外部融贯性,即所谓“自圆其说”。但是意义既然是社群在实践中共享的,就证实了人类感知的意义至少是部分是真知。例如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是古代社群共享的,在古代历法需要的实践意义上是真知;托勒密体系被哥白尼体系所取代,相当原因也是社群实践意义的需要:主要是因为到中世纪后期,以地心说编定的历法已经谬误太多,迫使哥白尼体系代替它成为“真知”,因为它更具有融贯性。只是哥白尼体系“与客观世界比较一致”,倒是次要的事,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事。

对意义世界构成的批判分析,常常必须从对意识的批判认识出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让人看到人的思索实际上是分裂的,被欲望驱动而无法完全自主。胡塞尔认为笛卡尔已经逼近现象学,只是未能进一步对“我思”的实体性进行悬置和分析。^{②⑤}而胡塞尔的主体观,则受到德里达的批判,德里达用主体不在场代替胡塞尔式的主体意向性论辩,用差异性取代现象学的意识整体同一性。既然意识是世界的构成物,对意识的批判性审视,就是意义理论应有的出发点。意识创造自己的意义世界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意识是世界的创造者。从文化社群的集合意识来说,更是如此。祝东教授详细分析了儒家的仪礼理论如何影响中国社会,指出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人类社会活动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制造意义,规范意义,而

又受意义规范的过程”。^⑤

有些专家强调生物也有周围世界,那么人的周围世界与一个甲虫的周围世界,有绝对的不同。或许可以争论说,不一定是人类才有这种把部分物世界对象化、意义化的能力,凡是生命之物,都有类似的能力,这就是于克斯库尔的周围世界理论。诚然,动物,甚至植物,都有把某种物(例如另一个动物)变成认知对象(是否可食),理解并判别(有无追杀可能),并且使用取效(追杀食之),这个动物用的标准是这个物种本能的意义能力。但是我们可以说动物的实践意义世界,与人的实践意义世界相比,不仅非常窄小,而且缺乏根据语境要求改变意义理解方式,更缺乏改造自然以取效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当实践条件变得严酷时,例如到了冰河期,动植物种群会绝灭,而人却能改变实践方式,缝皮为衣,取火煮食,滚木运输,甚至培植驯养以改造自然。至于意识多少独立起作用的思维世界,可能基本上是人类的专利。

由于意识对意义世界的奠基作用,物世界所具有的基本的“三性”,在意识世界中转化成新的三性:

物世界的唯一性,被不同的社群意识转化为意义世界的复数性;

物本质上的超理解性,因为意识把部分观相变成符号而获得意义性,符号对意义世界的模塑,形成周围世界的可理解性;

物的细节无限性,因为意识的有限性,变成意义世界的有限性。

这三个转变,造成人的意义世界与自在的物世界之根本不同。哪怕个人意识与群体的周围世界融合起来,最后形成文化社群共享的意义世界,实践意义世界依然是意识构筑出来的。因此,笔者一再强调,对意识构筑意义世界能力的有限性,无论个人主体还是社群主体,必须有必要的卑谦。人心并不是万物之主,意义世界也绝不是唯一的世界。但这是就人的心灵能力与社群意义的丰富的社会性而言的。意识构成的意义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穿透自在的物世界,这一点对人对动物来说,是类似的。

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但是自我不是世界的主人,或创造者,因此必须“反身而诚”,才是“乐莫大矣”。^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思维的作用必须保持警惕。这并不否认意识构造意义世界的伟大作用,这种作用没有达到笛卡尔主义的那种绝对万能的地位。

正是因为领会了休谟等人对理性的怀疑态度,康德提出了“先验范畴体系”,经验的各种范畴是内在的主观逻辑,而不是客观世界固有逻辑的体验总结,因此它们才成为超越事物特殊性的一种普遍有效性。凡是谈及对象的地方就已经有一种主动性了:对象化总是一种自我的主动作用。胡塞尔对这点说得相当准确:“一切从背景中发出刺激作用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在某种‘对象性的理解中被意识的……作为知识取向的可能基底而被理解的……未知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时是一种已知性模态”。^⑦既然“未知性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已知性的模态”,为了了解实践世界的潜力,我们要在实践意义世界进行有效的活动,首先要了解的是“已知性”,就是意识自身是如何构成的。

注:

- ①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9, pp. 111-112.
- ②⑨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3、7页。
- ③ The Essential Peirce, Bloomington: Univ of Indiana Press, 1992-1998, Vol. 2, p. 394.
- ④ Jesper Hoffmeyer, *Signs of Meaning in the Universe*, Bloomington: Univ of Indiana Press, 1996.
- ⑤ 关于“物化”和“符号-物”二联体滑动,请参见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 ⑥⑩ 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1、41页。
- ⑦ 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South Bend: St. Augustin's Press, 2003, p. 28.
- ⑧ 参见赵毅衡《真知与符号现象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 ⑪ 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 ⑫ E. H. 贡布里希:《视觉图像在信息交流中的地位》,载范景中选编《贡布里希论设计》,湖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 ⑬Owen Flanagan, *The Really Hard Problem: Meaning in the Materialist Worl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7.
- ⑭李广昌:《康德关于“意义世界”的目的论诠释》,《浙江学刊》2006年6期。
- ⑮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South Bend: St. Augustin's Press, 2003, p. 83.
- ⑯⑰杨国荣:《论意义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 ⑱Bertrand Russell, *Wisdom of the West a Historical Surve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Setting*, London: Crescent, 1959, p. 254.
- ⑲彭佳:《文化对自然的模塑:一个生态符号学模式的提出》,《哲学与文化》2015年第8期。
- ⑳赵星植:《论礼物的普遍分类:一个符号学分析》,《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8辑。
- ㉑Benjamin Wiker, Jonathan Witt, *A Meaningful World: How the Arts and Sciences Reveal the Genius of Natur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6, p. 8.
- ㉒Alfred Schutz, *Collected Papers vol.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MartinusNijhoff. 1973, p. 67.
- ㉓保罗·科布利编:《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周劲松、赵毅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 ㉔埃德蒙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1988年,第41页。
- ㉕祝东:《仪俗、政治与伦理:儒家伦理符号思想的发展及反思》,《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9辑。
- ㉖《孟子·尽心上》。
- ㉗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4页。

[责任编辑:青末]

How the Practical World of Meaning Forms from the Material World

Zhao Yiheng

Abstract: The practical part is the fundamental part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which is formed by human consciousness acting on the material world. Its coming into being is caused by three important human activities, which are recognition and distinction,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and reforming to achieve effects. The three kinds of activities are widely different in appearance, but they are practicality of meaning. The practical world thus created is a mixture of signs and objects: those objects that are understood by us are actually carrying meaning, and therefore, turning themselves into signs; and the objects that are beyond our consciousness have not yet fallen into our cognition, thus remaining parts of the world of things in themselves.

Keywords: world of meaning; world of things-in-themselves; cognition; understanding; effects